

百年利瑪竇研究

張西平*

本文對中國學術界近百年來的利瑪竇研究做了一遍鳥瞰式的回顧與總結，初步梳理了百年來利瑪竇研究的成果，總結了其不足，並對今後的深入展開研討做了展望。

明清之際西學傳入中國，其影響最大的人物莫過於利瑪竇。明清史籍對利瑪竇多有記載。⁽¹⁾艾儒略(Jules Aleni, 1582-1649)最早寫下關於利瑪竇的傳紀《大西西泰先生行蹟》⁽²⁾，近百年以來在中文學術研究的範圍內，利瑪竇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本文試圖對百年來的利瑪竇研究作一個簡要的回顧與總結，以求教於各位方家。

20世紀前半葉的利瑪竇研究

民國初年推動中國天主教史研究的最重要人物是馬相伯。1912年他和英斂之就上書羅馬教宗，希望開辦教會大學，認為“在我華提倡學問，而開大學堂者，英德美之耶穌教人都有，獨我羅馬聖教尚付闕如，豈不痛哉！”⁽³⁾他們認為，應繼承利瑪竇的學問之道，推動中國大學的發展。馬相伯認為：“教育者，國民之基礎也。書籍者，教育之所以藉以轉移者也。是以數年之國髓，傳於經史；五洲各國進化之程度，僉視新書出版多寡為衡。(……)然而，書籍之不注意，何也？”⁽⁴⁾由此，他重視收集明清間天主教中文書籍。馬相伯先後為《辯學遺牘》、《主制群徵》、《真主靈性理證》、《靈魂道體說》、《靈艷蠡勺》、《王覺斯贈湯若望詩

翰》等明清間中國天主教的重要中文文獻的出版做序，他在〈書《利先生行蹟》後〉一文中對利瑪竇在中國天主教史的地位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說，利瑪竇“生三十許，而學行大成，矢志繼聖人之志，愈遭坎坷而志愈堅，卒為我中國首開天主教之元勳”⁽⁵⁾。馬相伯認為，為了在中國傳播天主教，利瑪竇三十餘年刻苦學習中文，他通過翻譯介紹西方思想和文化，在這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唐之景教鄰於梵譯，元之鎮江十字寺碑，羈以音譯，遠不如利子近譯，戛戛獨造，粹然一本於古書，文質彬彬，義理周洽，沾丐後人，於今為烈，蓋不獨首開天主教為足多也已。”⁽⁶⁾

在馬相伯的積極推動下，英斂之、陳垣、向達等人以文獻整理為其主要使命，對民國初年的利瑪竇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貢獻。英斂之的主要貢獻在於重新整理出版了《天學初函》。民國初年，他經十餘年努力找到了《天學初函》的全本，為重新刊印其中的部分文獻，他在重刊《辯學遺牘》的序言中說：“《天學初函》自明季李之藻彙刊以來，三百餘年，書已希絕。鄙人數十年中，苦志搜羅，今幸尋得全帙。內中除器編十種，天文曆法，學術較今稍舊，而理編則文筆雅潔，道

*張西平，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主任，亞非學院院長。

理奧衍，非近人譯著所及。鄙人欣快之餘，不敢自秘，擬先將《辯學遺牘》一種排印，以供大雅之研究。”⁽⁷⁾《天學初函》包含了利瑪竇的十部著作，英斂之重新整理出版這本書，功不可沒。

民國初年對中國天主教史學術研究推進最大的當屬陳垣。在利瑪竇研究上他主要收集和整理了《辯學遺牘》、《利瑪竇行蹟》等文獻。陳垣對文獻的收集和整理極為重視。在談到這批文獻的整理時，他認為應該繼承李之藻的事業，把《天學初函》繼續出版下去，在給英斂之的信中說：“頃言翻刻舊籍事，與其請人繕抄，毋寧逕將要籍借出影印。假定接續《天學初函》理編為天學二函，三函……分期出版，此事想非難辦。細想一遍，總勝於抄，抄而又校，校而付排印，又再校，未免太費力；故擬倣涵芬樓新出四部叢刊格式，先將《超性學要》（二十一冊）影印，即名為天學二函，並選其它佳作為三函，有餘力並復影初函，如此所費不多，事輕而易舉，無繕校之勞，有流通之效，宜若可為也。乞函商相老從速圖之。此事倘性行之於數年前，今已蔚為大觀矣。”⁽⁸⁾為此，他曾肆力搜集有關史料，並計劃倣《開元釋教目錄》及《經義考》、《小學考》體制而為《乾嘉基督教錄》，為中國天主教的文獻作一次全面的清理，也為《四庫全書總目》補闕拾遺。他的這一計劃最終僅完成了一部分。

向達先生不僅是民國期間敦煌學的重要開拓者，也是利瑪竇文獻整理的重要學者。他在《上智編譯館》上所發表的《合校本大西泰利先生行蹟》是他把自己在法國、羅馬等地的幾個刻本統一勘校後整理出來的，是當時最好的校本。

正是在馬、英、陳等人的努力下，民國初年在這批文獻的收集和整理、出版上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在《天學初函》以外，他們發現並開始抄錄和整理了《名理探》、《聖經直解》、《利先生行蹟》、《天學舉要》、《真主靈性理證》、《靈魂道體說》、《鐸書》、《天教明辯》、《正教奉褒》、《聖教史略》、《寰宇詮》、

《聖夢歌》、《主制群徵》、《幼童教育》、《超性學要》、《王覺斯贈湯若望詩翰》、《教要序論》、《代疑論》、《天釋明辯》、《豁疑論》、《辟妄》、《代疑編》、《代疑續編》、《答客問》、《天教蒙引》、《拯世略說》、《輕世金書直解》、《古新經》、《三山論說》、《遵主聖範》等一系列天主教歷史文獻。這些文獻的整理和出版，對於民國初年的利瑪竇研究和整個天主教史的研究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20世紀20年代以後在利瑪竇研究上開始從文獻整理階段進入深入研究階段。這一時期在利瑪竇研究上有兩個領域十分突出，一是語言領域，一是地圖領域。

我們首先從語言學界對利瑪竇的研究說起。利瑪竇的《西字奇蹟》是最早的拉丁字母漢字注音方案。王徵和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西儒耳目資》吸取了利瑪竇的成果，更為系統地研究了這個問題，並在明末清初就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我們在方以智的《切韻聲原》、楊選杞的《聲韻同然集》和劉獻廷的《新韻譜》、《廣陽雜記》中都可以看到這一點。⁽⁹⁾鴉片戰爭後中國智識分子開始認識到漢語拼音對於識字的重要性，從陳垣先生整理出版了利瑪竇的《明季之歐化美術與羅馬注音》後，傳教士對漢字的注音歷史開始逐步引起人們的注意。從1892年盧懋章的《一目了然初階》開始，一直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蘇新字母》，1908年劉孟楊的《中國音標字書》，1916年劉繼善的《劉氏羅馬字》，都是在探討用羅馬字注音問題。在這些著作中都涉及對利瑪竇《西字奇蹟》的評價，例如利氏所用的字母數量，所發明的送氣符號等問題。

其間徐景賢1928年的〈明季之歐化學術及羅馬字注音考釋〉⁽¹⁰⁾和羅常培的〈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漢語音韻學的外來影向〉，是最有學術價值的文章。羅常培認為，對來華耶穌會士在倫理、論理、輿地、理化、生理、農業、水利、製造等各方面的成就都有了研究，但他們

在音韻學上的關係，不大引人注意。在他看來，利瑪竇等人在以下三個方面展開了研究：“1) 用羅馬字母分析漢字的音素，使向來被人看成繁難的反切，變成簡易的東西；2) 用羅馬字母標註明季的字音，使現在對於當時的普通音，仍可推知大概；3) 給中國音韻學研究開出一條新路，使當時的音韻學者，如方以智、楊選杞、劉獻廷等受到了很大的影響。”⁽¹¹⁾所以，他認為：“利瑪竇、金尼閣分析漢字的音素，借用羅馬字母作為標音的符號，使後人對於音韻學的研究，可以執簡馭繁，由渾而析，這是明末耶穌會士在中國音韻學上的第一貢獻。”⁽¹²⁾

這一時期討論利瑪竇在地理學上的貢獻的主要論文有洪業的〈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論利瑪竇地圖答鮎澤信太郎學士書〉，陳觀勝的〈利瑪竇地圖對中國地理學之貢獻及其影響〉、〈論利瑪竇之萬國全圖〉、〈乾隆時學者對利瑪竇諸人之地理學所持的態度〉等論文。

洪業論文的貢獻在於首次詳盡地考證了利瑪竇地圖在歐洲的收藏，說明了梵蒂岡藏本、倫敦藏本和米蘭藏本之間的關係。同時，他根據中文文獻考證了利瑪竇世界地圖在明末共翻刻十二次，每次翻刻的時間、地點和人物，從而對利瑪竇地圖在中國的翻刻和流變有了一個清楚的認識。⁽¹³⁾如果說洪業的論文主要從歷史學上考證利瑪竇所繪的幾種地圖的相互關係和流傳，那麼陳觀勝的論文則是從地理學的角度來評價利瑪竇所繪製的地圖。他認為利氏的地圖“對中國社會真是一件開荒介紹品，是中國人歷來所未見過的东西”⁽¹⁴⁾。具體來說，這種貢獻表現在：1) 實地測量：在中國歷史上，用近代新科學的方法和儀器來做實地測量的第一人恐怕就是利瑪竇；2) 地名的審定，這是首次用中文名對世界各地地名的審定；3) 介紹了歐洲大航海後的地理發現的新知識；4) 第一個介紹了世界的地圖；5) 有了五大洲的觀念；6) 介紹了地圖說；7) 介紹了地理學上地帶的分法。作為一個地理學家，他對利瑪竇並未一味地說好，而是將其放在當時的時代背景

下，也客觀地指出了利瑪竇地圖的問題和缺點；同時，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討論了為何利瑪竇所介紹的地理學的新知識沒有在中國流傳開來的原因，這些分析都相當的深刻。

從歷史學來看，1944年張維華所出版的《明史佛郎機呂宋和蘭意大利四傳註釋》是一本學術功力很深的著作，其中在意大利傳中，對利瑪竇的相關中文文獻做了相當好的考證與研究。方豪的《李存我研究》⁽¹⁵⁾、〈拉丁文傳入中國考〉⁽¹⁶⁾、〈十七、十八世紀來華西人對我經籍之研究〉⁽¹⁷⁾、《中國天主教史論叢·甲集》⁽¹⁸⁾、《方豪文錄》⁽¹⁹⁾、〈臺灣方志中的利瑪竇〉⁽²⁰⁾等一系列的論著大都涉及利瑪竇研究，其學術成就為學界所公認，被陳寅恪稱為“新會學案有後人”。

從翻譯著作來看，裴化行神父的(R. P. Henri Bernard, S. J.)的 *Le père Matthieu Ricci et la société chinoise de son temps, 1552-1610* 一書由王昌社翻譯，1943年由東方學藝社以“利瑪竇司鐸與當代中國社會”為名出版，這是在中國出版的第一本利瑪竇傳記。1936年馮承鈞所翻譯的法國教會史專家費賴之(Le P. Louis Pfister, S. J.)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至今仍是學者案頭必備之書，書中的〈利瑪竇傳記〉部分成為研究利瑪竇的最基本材料。當然，1936年出版的裴化行著、蕭濬華翻譯的《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也是一本受到學界好評的譯著。

上個世紀前五十年在利瑪竇研究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從文獻學上看，這一時期開啓了整理利瑪竇為代表的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的先河，他們所開啓的這個學術方向始終啓迪着中國學者的不斷努力；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在語言學、歷史學和地圖學這三個領域中那一代學者取得了很高的學術成就，即便站在今天學術發展的角度上看，羅常培對利瑪竇的語言學研究、洪業和陳觀勝對利瑪竇地圖的研究，仍具有很高的價值。

20世紀後半葉的利瑪竇研究

這一時期，從利瑪竇文獻研究來看，首先應肯定的是中華書局1983年出版的由何高濟/王遵仲/李申翻譯、何兆武校對的《利瑪竇中國札記》。這個本子是從金尼閣改寫本的英文版翻譯過來的，從譯本底本的角度看不是太理想，雖然也是國際學術界所認可的一個本子，然而何高濟等人的這個譯本有兩條值得肯定：一、它是中文出版領域的第一個譯本；二、譯本翻譯質量受到學界好評，其中所附的英文本序言和1978年法文版序言較好地提供了西方對這本著作研究的現狀，這是後來的臺灣譯本所不及的。臺灣輔仁和光啓社1986年聯合出版了由劉俊余和王玉川合譯的《利瑪竇全集》，這套全集在兩點上值得肯定：一是首次從意大利文版的 *Fonti Ricciane* 翻譯了利瑪竇的《中國傳教史》；二是首次翻譯出版了利瑪竇的書信集。但這套書冠名為“利瑪竇全集”，實際上祇是利瑪竇外文著作集，對於中文著作並未涉及，顯然用“利瑪竇全集”冠名有所不周。朱維錚主編的《利瑪竇中文著譯集》2001年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的價值在於第一次將利瑪竇的中文著作全部加以點校整理，如朱維錚在導言中所說：“研究應該從材料出發。利瑪竇生前公開刊佈的作品，主要是中文著譯，現存的至少十九種，理應成為探討利瑪竇如何認識和溝通這兩個世界文化的基本依據。”⁽²¹⁾但文集中所收錄的《理法器撮要》一書，學術界有所討論，有些學者認為這本書題為“泰西利瑪竇撰”的抄本乃是一本偽作，雖然它對於我們清理明清時期西式日晷製作技術在中國的傳承關係具有重要意義，但從版本學上看應不是利瑪竇的著作。⁽²²⁾2001年澳門基金會影印出版的羅明堅和利瑪竇所編的《葡華詞典》，是近年來所出版的利瑪竇的最重要原始文獻之一。1981年王綿厚在他的〈利瑪竇和他的兩儀玄覽圖簡論〉⁽²³⁾一文中，首次公佈了他所發現的藏於遼寧省博物館、李應式刻於1603年的〈兩儀玄覽圖〉。⁽²⁴⁾1982年林金水首次翻譯了利

瑪竇的部分文獻。⁽²⁵⁾李天綱的《明末天主教三柱石文箋註：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論教文集》是一部學術價值較高的著作，內容講的是三大柱石，但處處涉及利瑪竇中文文獻內容。

在利瑪竇文獻的研究上值得注意的還有中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珍品圖錄》中公佈了一篇題為“天主教教義”的文獻，目錄編者認為作者即“利瑪竇”。這份被稱為利瑪竇所寫的文獻是目前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時間最早的西文文獻。張西平在其《傳教士漢學研究》中發表的〈利瑪竇的《天主教教義》初探〉一文中⁽²⁶⁾研究了這份文獻，認為這篇文獻不應是利瑪竇本人所寫的文獻。楊福綿的〈羅明堅利瑪竇葡華字典所記錄的明代官話〉⁽²⁷⁾是近年來關於利瑪竇語言學研究的最有份量的學術論文。孫尚楊對《辯學遺牘》一書作者的內容做了分析，認為該書前篇為利瑪竇所作，後編為徐光啓所作，這個觀點在朱維錚的《利瑪竇中文著譯集》中也得到反映。⁽²⁸⁾張西平的〈天主教要考〉討論了利瑪竇遺失的重要著作《天主教要》的版本問題。⁽²⁹⁾鍾鳴旦、杜鼎克、黃一農、祝平一所編的《徐家匯藏明清天主教文獻》中收錄的利瑪竇的〈齋旨〉一文⁽³⁰⁾，鍾鳴旦、杜鼎克所編的《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中所收錄的利瑪竇的〈聖經約要〉⁽³¹⁾，都是近期所發現和出版的關於利瑪竇的重要的原始文獻，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在20世紀後半葉，利瑪竇研究中文學術領域首推方豪先生。他所寫的〈梵蒂岡出版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讀後記〉⁽³²⁾、〈利瑪竇教友論新研〉⁽³³⁾、〈明末清初天主教比附儒家學說之研究〉⁽³⁴⁾、《中國天主教人物傳》⁽³⁵⁾，都是研究利瑪竇的重要論文和著作。黃時鑒和龔纓晏的《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是20世紀後半葉利瑪竇研究的代表性著作，這項研究可以說在繼承民國期間洪業和陳觀勝研究的基礎上有了幾項較大的創新：其一，對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繪製和刊刻做了全面的研究；其二，對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知識來源和學術文化影響做了全面系統的研究；其三，對利

瑪竇地圖中所有的文字加以整理和校勘。⁽³⁶⁾羅光主教的《利瑪竇傳》是20世紀中文學術界最早的一本關於利瑪竇的個人傳記，⁽³⁷⁾張奉箴《利瑪竇在中國》、林金水和鄒萍合著的《泰西儒士利瑪竇》、汪前進的《西學東傳第一師利瑪竇》、張西平的《跟着利瑪竇來中國》⁽³⁸⁾，都從不同的側面描繪了利瑪竇在中國的活動。林金水的《利瑪竇與中國》是20世紀中文學術領域最早出版並受到學術界好評的一本全面研究利瑪竇的學術著作，至今這部著作仍是學者研究利瑪竇的案頭必備之書。利瑪竇是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的奠基人，這在張奉箴的《福音流傳中國史略》、嵇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論》、樊洪業的《耶穌會士與中國科學》、周康裔編的《利瑪竇研究論集》、許明龍主編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陳衛平的《第一頁與胚胎：明清之際的中西文化比較》、孫尚楊的《基督教與明末儒學》、陶亞兵的《明清間的中西音樂交流》、曹增友的《傳教士與中國科學》、《基督教與明清中國：中西文化的調適與衝撞》、沈定平的《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調適與會通》、何兆武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論》、張錯的《利瑪竇入華及其他》（香港）、張曉林的《天主實義與中國傳統》、張西平的《中國與歐洲早期宗教和哲學交流史》、《歐洲早期漢學史》、余三樂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早期傳教士與北京》、萬明的《中葡早期關係史》、楊森福《中國基督教史》（臺灣）、朱維錚的《走出中世紀》（一、二）、劉耘華的《解釋的圓環：明末清初傳教士對儒家經典的解釋及其本土回應》、莫小也的《十七—十八世紀傳教士與西畫東漸》、李天綱的《中國禮儀之爭：歷史·文獻和意義》、陳義海的《明清之際異質文化的一種範式》、張國剛的《從中西初識到禮儀之爭》及其主編的《明清傳教士與歐洲漢學》、張凱的《龐迪我與中國》、江曉原的《天學外史》、白莉民的《西學東漸與明清之際的教育思潮》、江曉源、鈕衛星的《天文西學東漸集》、李志軍的《西學東漸與明清實學》、戚印平的《遠東

耶穌會史研究》、王萍的《西方曆算學之輸入》（臺灣）、林中澤的《晚明中西性倫理的相遇：以利瑪竇的〈天主實義〉和龐迪我的〈七克〉為中心》、劉大春的《新學苦旅：科學·社會·文化的大撞擊》、李向玉的《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何俊的《西學與晚明思想的裂變》、金國平、吳志良的《東西望海》、《過十字門》、《鏡海飄渺》（澳門）、潘鳳娟的《西來孔子艾儒略：更新變化的宗教會遇本土化？文化交流？宗教對話？》（臺灣）、黃一農的《兩頭蛇：明末清初當代第一代天主教徒》（臺灣）、李爽學的《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臺灣）、董少新的《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等一系列學術著作，皆涉及對利瑪竇的研究和評述，分別從各個側面推進了對利瑪竇的研究。

在對利瑪竇研究的外文翻譯方面，2006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利瑪竇中國書札》是意大利學者 P. Antonio Sergianni P. I. M. E 所編輯的利瑪竇的五十四封書信，這是在大陸學術界首次出版利瑪竇的書信，其中部分內容在臺灣輔仁版的《利瑪竇全集》中也沒有，遺憾的是編者將利瑪竇的五十四封信完全打亂，按照自己設計的一個體系，將所有信件拆散後放入其中，難免將該本書的學術價值打了不少折扣。管振湖重新翻譯的《利瑪竇評傳》在商務出版。平川祐弘著、劉岸偉、徐一平翻譯的《利瑪竇傳》是目前國內出版的唯一的日本學者的利瑪竇傳記，值得關注。美國著名漢學家史景遷著、陳垣、梅義證翻譯的《利瑪竇的記憶宮殿》，是在國內大眾讀書領域產生較大影響的一部譯著。謝和耐的《中國與基督教》、柯毅林的《晚明基督論》、安田樸等人的《明清間入華耶穌會士和中西文化交流》、鍾鳴旦的《禮儀的交織：明末清初中歐文化交流史中的喪葬禮》等，都涉及利瑪竇在中國的活動，其中鄧恩著、余三樂、石蓉翻譯的《從利瑪竇到湯若望：晚明耶穌會士》是這些翻譯著作中最為重要、並在中文學術界產生影響較大的外文著作。

以上著作和論文表明，在中文學術研究領域對利瑪竇的研究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這表現在：在研究的範圍上大大擴展了，已經從傳統的傳教學研究幾乎擴展到人文社會學科的所有研究領域，從人文到科學，從歷史到語言，從藝術到自然，幾乎利瑪竇所涉及的所有領域都已經有人開始研究。這種研究範圍的擴展是上個世紀前五十年完全不可比擬的；第二，在研究的深度上大大加深了，對利瑪竇在晚明的活動，他與士人的接觸，幾乎在所有方面都有學者涉獵。中國學者充份顯示了熟悉中文文獻的優點，將利瑪竇研究與晚明史的研究充份結合起來了，從而加深了對晚明史和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第三，評價的標準多元化了。在50年代初對利瑪竇等來華傳教士的評價上最有代表性的是何兆武先生執筆的《中國思想史》第四卷第27章〈明末天主教輸入了甚麼西學？具有甚麼歷史意義？〉，它基本上是從負面的作用來評價以利瑪竇為代表的來華傳教士的。關於利瑪竇所傳入中國的科學的屬性問題至今仍可以討論，但學術界在對利瑪竇的評判的標準上已經完全走出了傳統的唯一從負面評價的立場，而開始在更為廣闊的視野下，從不同的學術側面展開了對利瑪竇的研究，利瑪竇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貢獻與奠基作用幾乎已經成為學術界的共識。

在以往的利瑪竇研究中，由於利瑪竇的主要外文著作尚未翻譯成中文，中文學術界在國際學術界除了個別學者外基本上發言權不大。隨着20世紀下半葉幾乎所有利瑪竇的外文著作和通信被翻譯成中文，相比較而言，至今利瑪竇的十九部中文著作仍未全部翻譯成英文或其它西方語言，這樣在文獻的閱讀和使用上中國學者具有相對的優勢，從而在利瑪竇研究上取得了快速的進展。現在我們可以說，如果不看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已經無法站在利瑪竇研究的前沿，中國學者已經成為引領利瑪竇研究的主力軍。

對今後研究的展望

儘管百年來對利瑪竇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進展，但由於利瑪竇處在一個中西文化交流的偉大時代，他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奠基性人物，因此，對其研究仍有很大空間，仍需學術界繼續努力。

首先，從利瑪竇原始文獻的收集和整理來看，四百多年來，儘管學術界和宗教界在不斷努力收集和整理利瑪竇的文獻，但至今仍有一些文獻尚未被發現，需要我們及後人繼續努力。根據筆者有限的閱讀，至少有以下幾種文獻：

一、關於“交友論”。利瑪竇《天主教傳入中國史》中曾經說：“另一本書則是以中文書寫，書名為《交友論》。(……)這本書是以拉定文與中文對照而寫，更引起讀者的好奇心，後來贛州區域知縣蘇大用出版中文單行本。”⁽³⁹⁾他又在1599年8月14日致高斯塔的信中說：“神父，你曾表示希望得到些中國東西，因此把我四年前所編譯的《論友誼》一書中的數頁，隨這封信一起給你寄去，(……)其中附有意大利文說明，祇是不如中文流利。”⁽⁴⁰⁾德禮賢經過多方考證，利瑪竇這個意大利文本藏於格列高利教皇大學檔案館(Archives of the 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 ms. 292)，由於文獻珍貴曾於1825年、1877年、1885年、1910年多次重印出版，德禮賢也於1952年將其再版一次。⁽⁴¹⁾這裡應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利瑪竇1599年寄回的中文和意大利文中的格言祇有七十六條。而在1601年版中格言已有一百條，如馮應京在序言中所說“交友論凡百章”，這說明《交友論》有不同的版本，他所說的中文和意大利文的對照本始終沒有發現。對中文學術界來說，重新發表德禮賢的整理本也是有價值的。

二、關於《中文拼音辭典》。利瑪竇第一次進北京失敗後，在返回南京的路上，他和郭居靜等神父一起編寫了一部供傳教士學習漢語發音的辭典。他說：“神父們利用這段時間編了一部中文字典。他們也編了一部中文發音表，這對傳教

士們學習中文有很大幫助。”⁽⁴²⁾這部文獻雖然前輩學者一直在努力尋找，也曾發現了一些線索⁽⁴³⁾，但至今仍未發現。

三、利瑪竇所譯的《四書》。利瑪竇在多封信中明確說他翻譯了《四書》，並把它寄回了歐洲，如他在1594年11月15號的信中說：“幾年前（按為1591年）我着手翻譯著名的中國《四書》為拉丁文，它是一本值得一讀的書，是倫理格言集，充滿卓越智慧的書，待明年整理妥後，再寄給總會長神甫，屆時你就可以閱讀欣賞了。”⁽⁴⁴⁾這本書至今下落不明。美國學者孟德若認為，這本書在中國長期被作為入華耶穌會士的中文課本，並成為後來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 1624-1692)等人所編譯的《中國哲學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的底本。⁽⁴⁵⁾這祇是一種意見，我個人認為這本書的原稿是會找到的，因為利瑪竇明確說過，他寄回了羅馬。尋找這份文獻應是一個重要的學術任務。

四、應關注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的有關利瑪竇的文獻。目前所發現和整理的關於利瑪竇的西方文獻主要是拉丁文、意大利文的。但利瑪竇在中國傳教時受到葡萄牙的保護，顯然，在葡萄牙的歷史文獻中應該仍有關於利瑪竇的文獻。尤其是西班牙著名耶穌會士阿羅索·桑切斯(Alonso Sánchez, S. J., 1551-1614)是個應該關注的重要人物。他於1581年奉命來到馬尼拉傳教。“1582年3月，桑切斯由馬尼拉啓程，4月漂流到福建沿岸，5月2日到廣州。旋被繫入獄中，經耶穌會士羅明堅請求而獲釋放。”此後他曾與羅明堅和利瑪竇多次見面並結下友誼，互有通信。⁽⁴⁶⁾阿羅索·桑切斯的這次中國之行祇得無功而返，但桑切斯在1583至1588年間，先後寫出三篇〈中國筆錄〉，其中也記錄了他和利瑪竇相見。這些文獻我們至今沒有掌握。

五、利瑪竇是在中國最具影響力的西方人，中國學術界已經將其主要的西方語言著作翻譯成了中文，但至今利瑪竇主要中文著作並未翻譯成英文或其它西方語言。⁽⁴⁷⁾意大利方面正在努力做

意大利文版的利瑪竇全集，這是值得肯定的。將利瑪竇的全部著作翻譯成一個完整的英文版，這應是西方學術界要做的一個基礎性工作。

從歷史與文化研究來說，系統地研究利瑪竇與晚明士人的交往，探討其和東林黨人的關係，是一個仍待深入的一個問題。利瑪竇對中國哲學的理解與他原有的中世紀哲學之間的關係也有待深化。荷蘭學者安國風所寫的《歐幾里得在中國》是一本值得關注的研究利瑪竇的新書⁽⁴⁸⁾，他採取中西文獻互照的研究方法，將歐幾里得的拉丁文本和利瑪竇的翻譯譯本，加以對比研究，同時對歐幾里得的接受史又加以詳盡的分析。目前，在中文學術界能像安國風這樣自如遊走在中西文獻之間展開歷史與思想文化研究的學者還不多。利瑪竇的多數翻譯著作祇有經過這樣的研究後才能徹底得到說明。這樣來看，我們實在還有許多基礎性的研究有待展開。

百年利瑪竇研究成績斐然，相對於利瑪竇與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廣闊研究領域，一切佛佛還剛剛開始，我們亟需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註】

- (1) 參閱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冊頁72-82，中華書局1988年。
- (2) 參閱鐘鳴旦、杜鼎克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十二冊，臺北利氏學社2002年。
- (3) 顧衛民《中國天主教編年史》頁431，上海書店2003年。
- (4) (5) (6) 朱維鈺主編：《馬相伯集》，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64；頁223。
- (7) (8) 方豪〈李之藻輯刻天學初函考〉，載《天學初函》重印本，臺灣學生書局，1965年版。
- (9) 參閱羅常培《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集》頁310-312，羅先生專列出一個“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貢獻年表”；葉寶奎《明清官話音系》，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年；譚慧穎《〈西儒耳目資〉源流辨析》，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年。

- (10) 徐景賢〈明季之歐化學術及羅馬字註音考釋〉，《新月月刊》第1卷第7號，1928年9月上海新月書店。
- (11) 羅常培〈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參閱《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集》頁252，商務印書館2004年。
- (12) 羅常培〈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參閱《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集》頁274，商務印書館2004年。
- (13) 洪業著《洪業論學記》頁150-193，中華書局1981年。
- (14) 陳觀勝〈利瑪竇地圖對中國地理學之貢獻及其影響〉，周康裔編《利瑪竇研究論集》頁131，香港崇文書店1971年。
- (15) 方豪《李存我研究》，杭州存我雜誌社1937年。
- (16) 方豪〈拉丁文傳入中國考〉，《浙江大學文學院集刊》1942年，《方豪六十自定稿》頁1-39，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
- (17) 方豪《十七、十八世紀來華西人對我經籍之研究》1943年《東方雜誌》，《方豪六十自定稿》頁185-203。
- (18)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論叢·甲集》，商務印書館1944年。
- (19) 方豪《方豪文錄》北平上智編譯館1948年。
- (20) 方豪〈臺灣方志中的利瑪竇〉，《方豪六十自定稿》頁605-612，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
- (21) 朱維鈺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頁2，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
- (22) 許潔，石雲里(2006)〈抄本《理法器撮要》作者獻疑〉，《或問》(日本) 11: 15-24。
- (23) 此文收入《遼寧省博物館學術論文集》中。
- (24) 王綿厚：〈論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和兩儀玄覽圖上的序跋題識〉，曹婉如、鄭錫煌、黃盛璋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4年。
- (25) 林金水〈《利瑪竇日記》選錄〉，《明史資料叢刊》，1982年，第2期。
- (26) 張西平《傳教士漢學研究》，頁59-80，大象出版社2005年。
- (27) 楊福綿〈羅明堅利瑪竇葡華字典所記錄的明代官話〉，《中國語言學報》第5期，商務印書館1995年。
- (28) 孫尚楊〈《辯學遺牘》作者考〉，見《基督教與明末儒學》頁40，人民出版社1994年。
- (29) 張西平〈天主教要考〉，《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1期。
- (30) 鍾鳴旦、杜鼎克、黃一農、祝平一所編《徐家匯藏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一卷，臺灣輔仁大學出版社1996年。
- (31) 鍾鳴旦、杜鼎克所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一冊，臺灣利氏學社，2002年。
- (32)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
- (33)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
- (34)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
- (35) 方豪《中國天主教人物傳》，香港公教真理學會及臺灣光啓社1967-1973，中華書局1988。
- (36) 黃時鑒、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 (37) 羅光《利瑪竇傳》，輔仁大學出版社1972年。
- (38) 張奉箴《利瑪竇在中國》，臺灣聞道出版社1985年；林金水、鄒萍《泰西儒士利瑪竇》，國際文化出版社2000年；汪前進《西學東傳第一師利瑪竇》，科學出版社2000年；張西平《跟着利瑪竇來中國》，五洲出版社2006年。
- (39) 《利瑪竇中國傳教史》，頁255，臺灣光啓社，1986年。
- (40) 《利瑪竇通信集》，頁258，臺灣光啓社，1986年。
- (41) D'Elia, P. M., "Further notes on Matteo Ricci's *De Amicitia*", *Monumenta Serica* 15 (1956), pp. 356-377.
- (42) 《利瑪竇中國傳教史》，頁286，臺灣光啓社，1986年。
- (43) 尹斌庸先生對此文獻有詳細介紹，《學術集林》，第一輯，頁349，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
- (44) 《利瑪竇書信集》，頁143，臺灣光啓社，1986年。
- (45) David E.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pp. 247-297, Stuttgart, 1985.
- (46) (法) 裴化行〈明代閉關政策與西班牙天主教傳教士〉，載《中外關係史譯叢》，頁264，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
- (47) 馬愛德主編《天主實義》英文版，Institut Ricci 1985。
- (48) (荷) 安國風著 紀志剛等譯《歐幾里得在中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